

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和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日] 菊池 一隆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的华侨给中国各种的支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关于这个专题的研究在战后很长的阶段里却没有展开,直至最近,在中国关于华侨支援抗战的研究,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华侨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以下简称“工合”运动)的积极支持也得到充分的评价。“工合”运动,是为了重建被日本侵略毁灭的工业而产生的小规模合作社式的工业自救运动,也是公开宣称为在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工合”是由海伦·斯诺提出的构想,埃德加·斯诺加以宣传,路易·艾黎则积极推进展开形成。计划草案是由上海的实业界和文化界人士胡愈之、梁士纯、王艺生、王国秀、王立明、费堂、徐新六、卢广绵等自发讨论协议而成,且向国民政府提出的。进而在1938年7月于汉口设立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的“工合”协会。“工合”主张“难民抗战”,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强烈支持;其运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环,发挥了经济的机能作用;且由于得到海外广泛支援,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合”跨国共两地区,西北、西南、东南各省偏远内地急速组织发展,大量生产军需、民用品,成为抗战工业生产的有力的支柱之一。本文专门以华侨援助“工合”运动为焦点,对其目的、实态、特征及其意义进行考察论述。

关键词 工合运动 华侨 统一战线

一 华侨和中国“工合”推进组织及机构的成立

中国在抗战时,因资金人才都非常缺乏,这使华侨的援助变的

不可或缺。国民政府对于争取华侨资金方面,作出种种努力和尝试。七七事变后,经济部发出《侨胞投资奖励办法》修正案,提出了华侨投资在农矿工商或与国防有关的事业中,占资本金总额60%以上的情况下,可减免捐税等优惠政策。10月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抗日经费的1/4由华侨提供,对于华侨经济实力寄以很高的期待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1938年4月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华侨也被纳入抗战动员体制中,其中第十七条中有“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的明确规定。10月武汉沦陷后,为了开发内地及西南援华通道的需要,特别征集了华侨技术人员回国。11月国民政府进一步颁布《非常时期华侨对国内经济事业投资奖励办法》,其中规定对华侨给予优惠政策:1. 在经营和技术上协助;2. 保证资本金等的利息;3. 付给补助金。在此影响下,华侨联合银行、归国华侨企业公司等重庆纷纷成立。^①这样,华侨对国内直接投资与战时加强生产之间有了明确的联系,华侨直接投资的企业也在不断建立。但是,仅此还未能充分展开,作为盘接华侨捐赠资金的“工合”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无锡等地沦陷,国民政府属下的占七八成的工业受到很大打击,而外国的进口也大量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纠正过去工业片面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的不平衡布局,转移到西南、西北工业不发达地区以发展民族工业基础的主张。以“抗战建国”时期的民生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族工业建设运动”为背景的“工合”运动,肩负着完成“民族战争”的重要

^① 拙稿《国民政府和世界的华侨》,见《二十世纪中国和日本》下卷,法律文化社1996年。潘文安:《华侨投资和国货工业》,香港《大公报》1940年11月24日。

使命就此展开。^①

“工合”协会的前身—上海的救国组织星一聚餐会(1937 年 11 月成立)里就有华侨萧宗俊的参加,因此可以说“工合”在草创时期到其发展都和华侨的参与分不开。作为“工合”发起组织,最早为 1938 年 12 月在上海租界内成立的上海“工合”促进社。该社以宣传号召将工厂和熟练工人转移到内地去为宗旨,取得一定成绩,最后不知结局,可推论是因日本军威逼压迫转入地下,不得公开活动,自然消亡。

1939 年 2 月“工合”香港促进社成立。该社名誉主席是宋庆龄,代理主席是爱达·普律德,技术顾问路易·艾黎,经理由广东银行负责人担任。机构内部由秘书、财务、技术、宣传、组织、募金等委员会组成。其目的是:1. 重建工业基础以增强抗战实力;2. 给伤兵、难民工作以自救自活;3. 将濒于危险区域的机械设备搬入内地;4. 用当地原料进行生产;5. 提倡国货等。且提出“国民政府是促进社的后循,华侨为促进社的先锋”的口号。促进社用中英文出版“工合”宣传刊物的同时,以社为窗口,接受捐款者的寻问,或者对捐款的使用是否妥当进行审议,给各区“工合”送款等。^②

5 月香港促进社在华商俱乐部,由宋庆龄和工商人士周寿臣、罗旭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香港有影响的人物,如英国国教会主教何明华、香港中国银行经理郑铁如、华商总会主席李星衢、上海储蓄银行经理王谦翊、广西银行经理张兆棠、吴铁城夫人、青帮巨头杜月笙及埃德加·斯诺等百人左右。会议首先作了工作报告,且强调了以“工合”运动筑成“经济长城”,形成了“中华民族

① 吴锐锋:《民族工业与民族战争》,《西北工合》第 2 卷第 4 期,1939 年 8 月 15 日等。

② 谢君哲:《经济的新堡垒》,生活书店 1940 年版,第 29、132 页;香港《大公报》1939 年 5 月 13 日。

的防卫”。罗旭和就国内外的救国、救济团体组织指出，“工合”是最能体现长期利益的组织。一国要谋求富强，首先是谋求人民日常用品的自给能力。而如何解决专业人材不足是当前的难题，从国民政府借贷基金中只能用于“工合”的费用，不足以作为训练教育人材的经费，因而需要世界各方的资金支援。如要促进“工合”运动，有必要在世界各地设立“支部”，以担负起募金事务，代理购买原料，征集各种专门人材，对国内外展开宣传等任务。^①而当初香港促进社的成立就是考虑到以此为中心，建立起国际联系网。

8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并作为独立组织，负责起国民政府“工合”协会以外的“工合”捐款的借贷、保管等事务。菲律宾中华商会主席也倡导成立“工合”的国际机关，管理起海外捐款。^②根据陈翰笙的说明，“工合”协会是遵照国民政府的意见，一手包办处理海外捐款的，国际委员会可以不持政治偏见，根据各地“工合”的成果来分配捐款资金。这样可形成海外机构和中国各地“工合”联系的桥梁。^③也就是说，国际委员会可以直接从海外接受捐款，进而保证“工合”独自的经费财源，就可以扩展各种活动。过去香港促进社是将从世界各地募集的捐款交给“工合”协会的，现国际委员会就成为包括香港促进会的全促进组织的中枢。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仅有和国民政府及“工合”协会的关系问题，还有资金分配的问题，东北人卢广绵（“工合”协会组织组长、西北区办事处主任）主张将重点放在西北区，而陈翰笙（无锡人）等则主张放在抗日基盘的西南部。由于资金有限，其分配一直是争论

① 香港《大公报》1939年5月13日。

② Nym, Wales, China Build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1941, p80; 东亚研究所译：《中国民主主义建设》，1939年5月13日。

③ 拙稿《陈翰笙访问记》，《近邻》第21号，1992年5月。

的热点。

这时国际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副主席兼会计郑铁如（中国银行总经理）、秘书陈翰笙、实地书记艾黎等，委员有前面论及的菲律宾中华商会主席等两人为菲律宾代表外，还有香港中央银行 P·N·陈（汉字名不详）、“工合”协会技师长林福裕、香港立法会议员罗文锦、爱达·埃德加·斯诺等 18 人。不久香港三大银行的中国、中央、广东各银行的代表者也包括在里面。“工合”以五分利息借贷资金，与“工合”有关的非生产性的训练班、学校、医疗所等则不收利息。根据必要性和紧急程度来审批资金的借贷申请，由委员投票决定。1940 年 4 月何明华在重庆和“工合”协会理事长孔祥熙、总干事长刘宏沛等就海外资金问题达成协议，结果国际委员会得到中国和中央两银行的保证，对海外资金及管理借贷负有全权。这样提高了信用度，很快在短期间从海外募金 35 万元。到 1940 年 7 月为止，国际委员会掌握征集到的捐款 100 万元，加上从中国、中央两银行的长期贷款 100 万元，合计 200 万元。其中：113 万（56.6%）分给东南各省。^① 1941 年 10 月国际委员会得到华侨捐款 500 万元，用于“工合”关连的事业有：1. 创立训练所；2. 增设医院；3. 增设学校；4. 设置化学室，及其用于“民主政治的发展”。^② 1941 年中，“工合”协会的人员与华侨的联系更加紧密，为加强在海外对“工合”运动的推进发展，菲律宾的薛士芬和“华侨抗敌救国会”主席杨启泰、火奴鲁鲁的杜惠生和“华侨抗敌救国会”主席杨星枢，美国的华侨领袖、国民参政员邝炳舜等都被招聘为“工合”协会理事。^③

① 谢君哲前揭书，第 30、131 页。

② 《华商报》1941 年 10 月 30 日。

③ 桂林《大公报》1941 年 7 月 28 日。

战祸的蔓延同时带来香港九龙难民的增长。1941年7月香港各界人士集合在英京酒家,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保卫同盟针对“150万香港华侨”提倡“一碗饭运动”,目的是支援“工合”,救济难民、伤兵。开幕式上除艾黎、华商总会主席郭泉、周寿臣、保卫同盟盟员廖梦醒等出席外,还有英军驻华陆军司令等150余人参加。剧作家夏衍、法律专家张友渔、演员王莹等发表文章和演说予以声援。运动持续了一个月,来吃“爱国饭”、“救济饭”的人络绎不绝,一张两港币的“餐券”售出超过了两万张。^①接着在11月,国际委员会和保卫同盟共同于香港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嘉年华会商品展览会。艾黎、宋庆龄、郑铁如、周寿臣等到会。展示品中有:反侵略资料、棉纺织物、化学制品等百余种“工合”的生产制品,还有华商报出版部等10间书店联合贩卖新刊书籍。会上收入全部交给“工合”。这样,在香港支援“工合”的各种筹金活动热烈地展开。进而,“工合”在海外也组织起来。抗日战争初期,从中国沿海各省到越南的中国难民有10万余人,为了救济难民,越南救国总会常务理事颜子俊等向当地华侨呼吁购买股票,投资到纺织、文具、肥皂、日用品、印刷等“工合”的企业里去。^②

在新闻媒介上宣传呼吁也为数不少。例如1939年11月香港《大公报》的社论中登载了文章,动员从资金、人才、技术三方面投向“工合”,指出“工合”可以解决紧急时期的民生问题,将来可以为工业建设打基础。同时也指出华侨不用投入很大的资金,不用费很多的精力,承担很重的责任,就可以支援“工合”。^③谢君哲也发表了文章,“华胞在外洋艰难刻苦地经营事业”、“一向是首先感受

① 刘家泉:《宋庆龄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73—377页。

② 何俊:《一年来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东方杂志》第35卷第4号,1939年9月。

③ 香港《大公报》1939年1月19日。

国势的强弱的刺激”，因而“所兴起的民族意识，也较内地同胞为坚强热烈”，而“工合”是救难民以“生产救济”的新兴民族工业，请华侨给予注意，呼吁掀起大量的捐款活动。^① 华侨内部也在积极开展宣传。例如在华侨的专刊《华侨先锋》杂志发表文章说，在英法，劳动者在工业合作社内为自己而劳动，谋求经济独立和自由。而只有中国的“工合”肩负着支援“抗战建国”的重任，追求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自由。具体来说，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以增强长期抗战的基本力量。且可吸收沦陷区的人力、原料，以阻止日本的利用。进而生产各种日用品，以排斥日货，拒绝用伪币，来反对经济封锁。

国民党在 1940 年 2 月纪念新生活运动六周年大会上，宣读了蒋介石的训辞的同时，也表示了国民政府从民生主义和“抗战建国”的立场出发，希望建立“工合”的意见。之后，国际委员会还介绍了筹集捐款情况，香港和马尼拉的促进社介绍了宣传活动，各“工合”组织介绍了如何提拔人才，解决运输工具和原料等事。指出虽然华侨不能作为“工合”的社员进行劳动，但是可以在当地参加促进社、集资和选拔人才、介绍最新工具等活动，为“工合”运动尽力。^② 这样，以香港的国际委员会、促进社为中心，国内有成都，海外马尼拉、纽约、三藩市（旧金山）、伦敦等地成立了中国“工合”促进组织。菲律宾、荷属印度（现印尼）、马来亚、缅甸、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侨和各国人民都积极支援中国的“工合”运动。^③

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后，虽然香港促进社停止了活动，但国

① 谢君哲前揭书，第 14—5 页。

② 龙大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华侨先锋》第 1 卷第 19 期，1940 年 4 月 1 日。

③ 香港《大公报》1940 年 9 月 8 日；陈翰笙前揭书，32 页等资料。

际委员会转移到成都。主席何明华留任,副主席为约翰·洛辛·巴克(南京大学教授)、书记为赖璞吾(燕京大学教授),组织工作由艾黎、陈翰笙担任。

二 南洋华侨对中国“工合”运动的支援

南洋华侨约有七八百万人,对南洋经济贸易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地区人口分布上看,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占42%,泰国占22%,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各占2%,菲律宾占1%。^①这里想以最积极支持“工合”的菲律宾华侨为中心展开论述。菲律宾成为美领属(1902年)以来,禁止外国劳工进入,且美国和菲律宾人煽起排斥华人运动,华侨人数很少,仅七八万,加上用当地名的华侨,估计约有十七八至二十万人左右。其中福建人占八九成,余为广东人。职业主要是贸易、金融、零售商等,占七成以上,已形成上流富裕阶层,而下层劳动者,农民占极少数。从马尼拉商业投资额(1936年)看,华侨占36.4%,美国人占25.7%,菲律宾人占14.5%,日本人占8.3%。在经济界有不少著名的华侨,如益华商业公司总经理薛士芬、福泉公司的李清泉、中兴银行的薛敏老、瑞隆兴铁业公司的杨启泰等。七七事变后,往中国的汇款明显减少,但菲律宾仍达约千万元左右。华侨人平均计算,如菲律宾华侨献金100元,马来亚华侨才献金30元。菲律宾华侨对华贸易主要是出口木材、麻、烟草等,进口主要是面、棉布等。原来华侨贸易额为第一位,七七事变后,美国变为第一位,日本为第二位,华侨则下降

^① 前揭拙稿:《国民政府与世界的华侨》。

为四五位。^① 因此, 菲律宾华侨深感到日本的威胁, 故有着强烈的抗日意识。

从政治上看, 在 1936 年 2 月菲律宾华侨劳动界已召开反日代表大会, 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是说在七七事变前, 已经形成抗日的基础。事变后, 马尼拉中华商会马上打电报给蒋介石拥护“对日强化策”。蔡廷锴在碧瑶和马尼拉发表了“抗日救国献金”的演说。结果由中华商会成立了菲律宾抗敌委员会。1937 年 10 月孔祥熙访问马尼拉, 鼓动献金活动, 带动了高涨的献金募集热潮。华商成立起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和航空建设义捐会, 各有 30 多个支会, 筹集了大量的支援中国基金。10 月 31 日拥护民主主义联盟召开大会, 有 500 人参加, 通过了: 1. 排斥日货; 2. 拥护中国民众对日抗战; 3. 支援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国际共同行动等“反日决议”。1938 年 6 月华侨各商会一起开始排斥日货行动。并且在七七纪念日, 抗敌委员会和中华商会等召开大会, 提出了“打倒日帝”、“肃清仇货”、“拥护抗敌建国纲领”、“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万岁”等口号。^②

如前述, 中国的状况对于华侨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有着紧密的关系。华侨都非常关心抗战。例如: 在菲律宾, 随着中国被侵略而导致国际地位的降低, 出现了以中国人为耻, 遮掩隐瞒身份的现象^③, 正由于此, 反日运动更加激化起来。华侨各阶层更加有组织地、热心地参加救国事业, 不仅表现在排斥日货和捐款上, 而且希望用高价购买中国国产品来支援中国抗战。但是在南洋中国商品

① 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室:《在菲律宾的华侨》, 1939 年版, 第 2、19、84、107、110、120、143 页。

② 同上, 第 34、174—177、189—190 页等。

③ 同上, 第 34、174—177、189—190 页等。

很少,而“工合”生产的大量商品出口到南洋正迎合这种需要。抗战爆发后,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运动有六七回高潮,约有三四千人以上。^①其中多数是有专门技术的华侨青年,如林福裕、王毓麟、王文炜等直接参加了“工合”。

因埃德加·斯诺对于中国“工合”的支援,所以在菲律宾支援“工合”运动是从马尼拉的YMCA秘书马可纳特夫人的活动开始的。海伦·斯诺和埃德加·斯诺则竭尽全力征集人才。1939年4月菲律宾“工合”促进会正式成立。美国高等事务官的夫人鲍尔·V·玛克拉德和菲律宾总统夫人为名誉会长,W·B·福雷博士(新教牧师)为会长,李清泉为副会长,各界有实力人物为委员,各部门的职员都由华侨负责,会员有100人(年会费14比索,或7美元)。这样不仅是华侨、菲律宾人、当地少数民族,还有美、英、法、西班牙等各国人民,及其基督教会,红十字会,YMCA等组织的首脑、实业家、律师、医生、教授、社会事业家等都参加了运动。因而在菲律宾的支援中国抗战组织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层。据海伦·斯诺所述,在菲律宾,捐款给“工合”的献金中,占2/3是由华侨捐赠的。^②香港促进会从菲律宾华侨处得到捐款在1939年年中就有21.5万元。其中大部分是由李颜欸(李清泉夫人)领导的华侨妇女救济协会所赠。^③艾黎在菲律宾滞留两个星期,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接受了向“工合”捐款15万元。作家林语堂也被菲律宾促进会邀请来马尼拉演讲,林对众多的听众发表了日本的国力已经枯竭,中国已经占优势的演说。其入场券全部为“工合”的捐款。^④

① 陈侨珍:《救国工作在南洋》,《西北工合》第2卷第6期,1939年9月15日。

② Nym Wales, op. cit., pp. 182-4.

③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推进委员会:《工合之友》第1卷第7期,第245—246页。

④ 《西南工合》第2卷第5期,1940年6月,第10页。

进入 1941 年后,促进会员已经增加为 200 余名。就任为促进会主席的薛士芬(中华总商会主席),抗战救国会主席杨启泰等都支援“工合”运动。“工合”已把菲律宾的华侨及英、美人都联合在一起,作为支援中国抗战主要力量之一。促进会在两年间筹金 30 万元。为响应美国援华联合委员会(后述)的全美募金运动的号召,在菲律宾,促进会也展开了 7 月 50 万元的募金运动。对此马尼拉、碧瑶等地的新闻报纸,也发表了支援的专论文章。原中国驻美国大使王正廷,驻比利时大使杨光也在广播上作了支援演说。杨在演说中阐述:四年来忍耐了极大的牺牲,在保卫人权、自由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是由于“工合”运动的强化发展在社会、经济基础的体现。此后,孔祥熙还发来贺电“中国为世界和平而抗战”指出,在菲岛美菲友人及中国侨胞的捐款活动,直接给中国及难民都带来帮助和裨益。援助“工合”事业比援助其他有着更大的意义。^①

1941 年 10 月左右,菲律宾促进会发出《敬告菲岛人士书》,称“工业合作社,正如驰名于世界上的商标,是中国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一个商标。工业合作社并非一种战争活动,或一种慈善事业。它代表一种崇高理想,为抵抗侵略者剥削之经济堡垒。这是自由人民追求和平与民主的行动”。从各国送来的捐款是基于人道主义,与政治、宗教无关,款项首先用于培黎工艺学校的建设,进而在中国最小单位的纺织“工合”(仅 25 比索)、机器“工合”(2000 比索)就可以完成预期投资。^②因此,促进会向国际委员会寄钱以资

① 《本会菲律宾促进会发动工合募捐运动》,《工业合作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41 年 10 月;《工业合作月刊》,同上,第 61 页。

② 《本会菲律宾促进会发动工合募捐运动》,《工业合作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41 年 10 月;《工业合作月刊》,同上,第 61 页。

助“工合”、培黎工艺学校、技术训练班等。促进会的亚帛曼(中国之友社主席)访问新加坡时,也向当地的中华总商会主席李光前等请求支援“工合”。促进会一直存在到1941年12月日本入侵后。

在此,新加坡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动向值得一书。九一八事变时,他曾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呼吁抗日爱国运动。这与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橡胶价格暴跌,在与日本商品竞争中,陈的公司经营受到沉重打击不是没有关系的。西安事变时为了团结和统一,召开了华侨援蒋救国大会。七七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发起成立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且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①1938年10月,作为南洋“八百万华侨”的代表组织机构南侨总会宣布成立。1940年4月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常务委员侯西反一行到重庆参观了毛毯“工合”(后来,顶着国民党的反对压力,访问延安,会见了毛泽东等,转为支持中共)。陈认为“工合”形成于经济战的最前线,面对日本军队实行各种封锁、战时空袭轰炸大城市工业区域的严峻形势,只能运用持久战,要持有诚意促进“工合”,以图迅速发展,增加生产,支持抗战。^②陈最忧虑的是:国民党要把西安“工合”好像“共产主义”一样,加以镇压。^③也就是说陈特别担心由于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裂,造成抗日力量削弱。

侯西反提出“工合”有4点重要的意义:1. 生产自救。国家救济难民消耗了大量的金钱,而很难达到社会救济的效果,在这点上,“工合”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又扩大了生产。因此,不浪费

① 徐盈:《陈嘉庚》,《中国工业》第2期,1945年8月。

② 张法祖前揭书,第357页;陈嘉庚:《参观重庆工合社后的感想》,《川康工合》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

③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人力、财力的“工合”运动是最进步的运动。2. 现在的国家如没有工业,也就没有国防。“工合”则在前后方建立了新的国防经济基础。3. 资本主义国家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发生劳资冲突。对此中国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的最高原则。而“工合”社员既是劳动者,也是经营者,利润也是公平分配。这可以说是完成民生主义经济的桥梁,是理想的自治工厂。4. 中国人民缺乏组织能力,而“工合”是劳动者自主地组织起来的生产集团。可培养劳动者学习管理组织,培养集体生活的习惯。因此,呼吁华侨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给“工合”运动以最大贡献和援助。^①

三 美国华侨对中国“工合”运动的支援

在美国,华侨以纽约为中心掀起强烈的反日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当夜,华侨反帝大同盟,华侨洗衣联合会,致公堂(在全美大陆各地均设置据点,是天地会背景的巨大结社团体)等组织共同召开会议,以宣传抗日和筹款为目的,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广东人)等被选为实行委员。7月13日,工人保障会华人部,反帝大同盟等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动员全国海陆空军支援华北,动员全国民众”的请求。10月,司徒美堂呼吁在纽约的华侨54个团体,组织“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在三藩市和波士顿都有同样举动。美国华侨积极地扩展捐款及抵制日本商品,阻止向日出口废铁等运动。^②

1940年4月,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等向美国提出支援中国的请求,且在NBC上向全美国民播送。三姊妹为孙文、孔祥熙、蒋

① 侯西反:《工业合作运动的意义》,《川康工合》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

② 前揭拙稿:《国民政府和世界的华侨》。

介石的夫人,理所当然在华侨中有着极大号召及影响力。首先,宋庆龄表示,中国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宋霭龄指出,中国在财政、经济方面已经计划和准备抗战到最后,中国从东部将无数的机器运到西部,同时组织了 1400 个“工合”社,3 万人以上的人参加工作,可赡养家庭。她还举例说明,通过妇女界运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等组织的“伤兵之友”运动,恢复我民族固有的合作精神,就能够克服困难。最后,宋美龄阐明,万一日本武力占领中国,就会利用中国的领土、人力、资源来与民主国家对抗。日本还会强烈地打击民主国家,掠夺印度支那的缅甸、马来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而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美国在抗战。^①

在菲律宾,薛士芬征得在菲律宾的 180 位美国人的支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更加强有力地支援中国的“工合”运动。说明支援“工合”以生产自救,是解决困难的重要方法。华侨振兴“工合”的理由有 3 点,即 1.“工合”可以迅速地动员起资源和生产力,掌握起军心民意,起到支撑民族气概的重要作用。支援“工合”的金钱虽少,但起着促进中美友好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2.“工合”是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远东的国际通商和合作打下基础。而且这是纯粹由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事业,没有党派性特征。3.“工合”如能获得充分的资本,就能形成在中国内地的经济堡垒以对抗防御日本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薛士芬还指出“工合”协会是半官半民的组织,从四大国家银行和民间银行借贷资金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外币更换支付时有困难,因而有必要从美国征集大量的贷款。^②

1941 年 4 月左右,中国“工合”协会推进组长梁士纯受孔祥熙

①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二周年纪念特刊》,1940 年,第 63—64 页。

②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通信》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41 年 1 月,第 22—23 页。

之命,进行两个月的访问美国活动。其目的是推进海外的“工合”运动工作,及协助美国各援华团体的对华联合捐款活动。梁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地来回奔走,且在往返途中,到了马尼拉、火奴鲁鲁等地。梁与各地的华侨领袖,各界官民就推进“工合”运动进行谈话。华侨过去一直就强烈拥护中国抗战,例如芝加哥华侨仅有 1000 人左右,大部分还是从事洗衣行业,收入也不高,而七七事变以来,捐款达到 100 万美元以上。梁的来访,使当地的支援抗战气氛更加高涨。5 月,在美华侨“工合”推进委员会于纽约成立准备会。委员由有实力者李国钦、林语堂、杨天孚、司徒美堂等 11 人组成。且火奴鲁鲁华侨也在 5 月成立“工合”推进委员会,名誉主席杜惠生(总商会主席),主席陈绍雄,委员中有总领事梅景周等头面人物。^①

这个时期,在美国的援华捐款运动非常高涨。七七事变以来,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认识。有的美国人认识到是中国的奋斗才使日本侵略不至于波及到太平洋来,是起着“第一防卫战”的作用,因而援华团体纷纷成立。其中有针对中国“工合”的,也有针对难民援助或医疗援助,没有统一性。直到 1941 年 4 月左右,全美的援华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为“美国对中国救济事业联合委员会”(名誉主席为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从 1941 年 4 月到 7 月征集到援华救济费用 500 万元美金(其中 100 万元美金分配给“工合”)。特别在 5 月的一周定为“中国宣传周”,各大城市都进行募金活动。其目的: 1. 援助医药品; 2. 援助设立“工合”3 万社; 3. 援助撤退到后方的各大学; 4. 救济

^① 《旅美及檀香山华侨领袖发起成立工合推进委员会》,《桂林大公报》1941 年 7 月 28 日。

难民。^①由此可见,在美国也是把“工合”当作中国抗战和中国建设中最有价值的一项运动来看待。

四 海外华侨的捐款和中国“工合”运动

华侨出身在福建、广东两省为多,因而对这两省非常关心。华侨资金就相对较集中到包含两省的东南区“工合”。1938年10月江西创立东南区办事处时,其资金由宋子文介绍,中国银行借贷20万元,还有部分是以马尼拉为中心的华侨献金。^②进入1939年,东南区的资金中,“工合”协会占25.8%,香港促进社占38%,华侨募金占36.2%。另外,香港促进社的募金中含有大量华侨捐款,这样华侨募金中所占的比率更大。仅在南洋福建省籍的华侨就在400万以上。1936年以来外币更换寄钱回乡的,每年都在5000万元以上,不仅解决了家族的生活费用,且有力地填补了中国对外经济赤字。七七事变以来,由于海港封锁,寄钱增加困难,因而福建省银行成为本省的金融中心,且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以方便华侨寄钱。据谢君哲所述,菲律宾妇女赈济会设立特别基金,其目的:1. 给福建“工合”6万元;2. 给东南区办事处2.08万元;3. 给福建运输“工合”18.7016万元。^③还有华盛顿华侨给广东省北部1000美金以设立数间“工合”社。^④

对此,“工合”协会产生了纠正这种华侨援助资金过于集中在东南区的想法。1939年6月“工合”协会接受了爪哇烟草巨商林

① 前揭,《工业合作月刊》第1卷第1期,第91—93页。

② 陈翰笙:《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过去与将来》,《太平洋学会美国分会》,1947年,第17—18页。

③ 拙稿:《在东南区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社会文化史学》第23号,1987年。

④ 香港《大公报》1940年9月8日等。

西田的献金 10 万元,用于成立西北区“工合”。^① 在 1940 年左右,将菲律宾妇女赈济会的捐款 6 万元用于安徽省南部成立“工合”。1940 年 3 月将国际委员会和香港促进社的补助金 6000 元用于在云南省大理举办“工合”指导员训练班,数十名指导员经过训练后,被派遣到各地事务所任职。^② “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视察员侯雨民(广东人,英国伦敦大学硕士)也提倡支援西北。过去,国民政府有以重庆为中心,昆明和西安为两翼的想法。侯认为,投资西北“工合”既有利且安全,还能加快“抗战建国”的步伐,提醒华侨对西北的重要性的认识。^③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华侨不仅在国民党地区支援“工合”,也支援了延安“工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工合”协会以“行政费”名义借出的款项计 2.15 万元,于 1939 年 4 月设置“工合”延安事务所。但此后,就没有再给资金援助。1940 年国际委员会从马尼拉的捐款中拨出 10 万元给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织“工合”。1941 年—1943 年,国际委员会和保卫同盟还从菲律宾、荷属印度各地华侨及美英“工合”促进会的献金中,拨出 100 多万元送给延安“工合”。在中共控制区域太行山区,为了抗日游击队用的大量军布、毛巾的生产而成立的数间织布“工合”社,也收到马尼拉、爪哇华侨的捐款。^④ 由此可见,华侨明确支持抗日统一战线,对于国共两地区的“工合”都给予同样的支援。对一般银行不想借贷给在

① 香港《大公报》1940 年 9 月 8 日等。

② 拙稿:《在云南省的中国工合运动》,大阪教育大学“历史研究”第 24 号,1987 年。

③ 侯雨民:《海外侨胞应积极资助西北工合运动》,《西北工合》第 3 卷第 5 期,1940 年 6 月 1 日。

④ 陈翰笙前揭书,第 29、31 页;刘家泉前揭书,第 373 页;拙稿《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22 辑,1993 年 5 月等。

前线、战区、日本占领区的“工合”，华侨也无视利益的得失，依然借贷资金款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爪哇等地的华侨陆续回国。仅广东就有二三十万人，加上福建、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归国华侨约有 50 万人以上。^① 梁士纯认为不能把华侨等同于一般难民，第一，华侨一直都有贡献给祖国，现不屈于日本的侵略，放弃了自己经营的事业归国，是应该得到款待的。第二，华侨是中华民族精华，具有丰富的工商业技能和知识，有很强的责任感，及民族自觉、爱国精神。确实，国民政府及福建、广东、云南各省政府在实行临时紧急救济措施以外，还计划开设工厂和农垦事业，但华侨大多在国内既无财产，又无贮蓄，回国后马上就需要工作。这种状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工合”运动。因为这可以激发带动他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同时也是华侨在居住国进行的抗战宣传和捐款运动的目标所在。^② 之后，由于日本占领统治了南洋，南洋华侨已不能正常地募金寄钱回国，而美国华侨继续开展抗日运动，还不断地进行对“工合”捐款活动，虽然数量上比前减少。

结束语

第一，1937 年 7 月由于日本的侵略，而国民政府没有充分地进入临战体制，因而在军事实力、资金、人才等方面都显出劣势。这时，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华侨的资金实力。号召华侨资金投入到各种抗战救国运动中去，其最好的盘接华侨资金的方法就是扶殖

① 梁士纯：《救济归侨与发展工合》，《工业合作》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1942 年 8 月。

② 梁士纯：《救济归侨与发展工合》，《工业合作》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1942 年 8 月。

“工合”。华侨最担心的是阻碍对日抗战的国共分裂。而国共两党都支持的“工合”自身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对华侨来说,“工合”是最好的支援对象。华侨对“工合”的支援主要在华侨祖籍最多的福建、广东等地,同时,也平衡地支援了国共两地区,对于资金极度不足的边区来说,其支援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抗日战争具有相当浓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意味,“工合”运动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在未开发的西南、西北部筑起工业基础,形成“民族工业建设运动”。而且“工合”是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关连的理论上展开的,宋庆龄也认为这是民生主义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华侨在居住国的地位与中国的状况变化紧密相联,且日本的侵略势力扩张,直接影响到华侨的经济权益,因而使其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展开高涨的救国运动。这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起着唤醒民族主义、集合民众的作用,华侨自身也把“工合”与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工合”得到广泛的支持。

第三,当时,最实际的困难是难民问题。6000 万人的难民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如处理不好,就可能会造成抗战实力的削弱。但是国民政府由于资金不足,以一般慈善事业来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困难。这时华侨也在注视着难民问题,因之产生扭转困难局面的“工合”主张,以“生产救国”解决该问题。

第四,华侨向“工合”捐款,即使在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也是由“工合”协会和香港促进社等处分散而来,集中金额是很困难的。根据陈嘉庚所述,抗战爆发以来,到 1940 年 4 月华侨向中国寄钱达 20 亿元中,8 亿元是中国抗战的捐款,两年间向“工合”的捐款达到 100 万元。^①另外,海伦·斯诺统计:在 1940 年“工合”运动的

① 张法祖前揭书,第 357—358 页。

全部资金财源有 3663 万元,其中政府出资占 32.2%,从银行借款占 63.33%,海外援助金占 5.16%,社员股份占 1.04%。^① 华侨大量向中国寄钱,虽然用在“工合”的资金中不算多,但却有重要意义。“工合”作为大众运动,要保持灵活性和自主性,除了政府和国家银行以外有必要保持独自的资金来源。而“工合”协会属于行政院管辖下,“工合”运动仍然以无党派面目在继续活动中,在一定期间,离开了合作事业管理局(1939年5月成立,行政院经济部所属)的支配管理,其原因就在于有海外的支持和资金援助。在国民党地区及战区,乃至边区的“工合”中使用这些资金,补充加强了战时的生产,这个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作者菊池一隆,日本国立大阪教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① Nym Wales, op. cit, pp. 191—2。